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错误!未定义书签。
引 言	错误!未定义书签。
1 正文格式说明	1
1.1 论文格式基本要求	1
1.2 论文页眉页脚的编排	2
1.3 论文正文格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4 章节标题格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5 各章之间的分隔符设置	错误!未定义书签。
1.6 正文中的编号	错误!未定义书签。
2 图表及公式的格式说明	3
2.1 图的格式说明	3
2.1.1 图的格式示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2.1.2 图的格式描述	错误!未定义书签。
2.2 表的格式说明	4
2.2.1 表的格式示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2.2.2 表的格式描述	错误!未定义书签。
2.3 公式的格式说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2.3.1 公式的格式示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2.3.2 公式的格式描述	错误!未定义书签。
2.4 参考文献的格式说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2.4.1 参考文献在正文中引用的示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2.4.2 参考文献在正文中引用的书写格式	错误!未定义书签。
2.4.3 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	错误!未定义书签。
2.4.4 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示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2.5 量和单位的使用	错误!未定义书签。
2.5.1 使用方法	错误!未定义书签。
2.5.2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错误!未定义书签。
2.6 规范表达注意事项	错误!未定义书签。
2.6.1 名词术语	错误!未定义书签。
2.6.2 数字	错误!未定义书签。

2.6.3	外文字母	错误!未定义书签。
2.6.4	量和单位	错误!未定义书签。
2.6.5	标点符号	错误!未定义书签。
3	打印说明	6
3.1	封面	6
3.2	原创性声明	7
3.3	关于使用授权的声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3.4	中英文摘要	错误!未定义书签。
3.5	目录	错误!未定义书签。
3.6	正文	错误!未定义书签。
4	论文装订注意事项	8
4.1	设计说明书（论文）	8
4.2	外文翻译	9
4.3	装订规范要求	错误!未定义书签。
5	第五章题目（黑体，小三，1.5 倍行距，段后 1 行）	错误!未定义书签。
5.1	第一节题目（黑体，四号，1.5 倍行距，段前 0.5 行）	错误!未定义书签。
5.1.1	第一节一级题目（黑体，小四，1.5 倍行距，段前 0.5 行）	错误!未定义书签。
5.2	第二节题目	错误!未定义书签。
5.2.1	第二节一级题目	错误!未定义书签。
结 论	（设计类为设计总结）	错误!未定义书签。
参 考 文 献	10
附录 A	附录内容名称	错误!未定义书签。
修改记录	错误!未定义书签。
致 谢	错误!未定义书签。

1 历史逻辑与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方针下的中非关系

中非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其发展脉络深植于双方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共同斗争之中，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升华。本章旨在系统梳理中非关系从“兄弟情谊”到“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演进逻辑，并深入剖析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这一关系提供的理论基石与行动指南，阐明其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意义。

1.1 历史回溯：从“兄弟情谊”到“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步履

中非关系的起点建立在对平等与正义的共同追求之上，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历史形成了本质区别。这段由共同奋斗凝结而成的“兄弟情谊”，为双方构建高水平政治互信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基础。

共同的历史使命是双方关系的政治根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与众多非洲国家均面临打破旧有国际秩序枷锁、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历史任务。在此背景下，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成为中非合作的起点。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不仅成功化解了与会国间的分歧，更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凝聚为国际共识【此处建议插入参考文献，如《万隆会议文件汇编》或相关权威史学著作】。毛泽东主席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论断，则从理论上将中国定位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奠定了双方团结合作的理论基础【此处建议插入参考文献，如《毛泽东外交文选》】。

无私的援建项目是“兄弟情谊”的实物丰碑。在非洲国家寻求经济独立的关键时期，中国克服自身困难，提供了雪中送炭般的帮助。其中，坦赞铁路（1970-1976年）是最具代表性的典范。该铁路全长1860.5公里，由中国提供无息贷款并派遣数万工程技术人员援建，在勘探、施工过程中有超过60名中国专家献出了生命【此处建议插入具体数据，参考《中国与非洲：合作的历史与现实》等官方出版物或纪录片资料】。这条被誉为“自由之路”的铁路，彻底打破了当时南非和罗德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的经济封锁，彰显了中国国际主义精神与守信重诺的品质，成为南南合作史上永不磨灭的丰碑。

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是政治互信的试金石。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76张赞成票中，非洲国家贡献了26票，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处建议插入联合国官方会议记录或中国外交部相关历史文献】。这一历史性事件，被毛

泽东主席形象地称为“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这不仅是一次外交胜利，更是中非在政治上相互依存、在道义上相互支撑的集中体现，将双方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中非关系的历史逻辑始于对平等主权的共同捍卫，成于相互支持的坚实行动。这段历史赋予了中非关系超越单纯利益交换的战略价值和情感厚度，为其在新时代升华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

1.2 新时代的理论指引：习近平外交思想与“真实亲诚”理念的深刻内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对非政策在继承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上的系统化与理念上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成为指导新时代对非工作的根本遵循，展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真实亲诚”理念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这四个字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深刻指导着中非合作的方方面面：

“真”，在于以诚相待的政治品格。中国始终将非洲视为平等、重要的战略伙伴。这种“真”，体现在双方交往的透明度上，体现在处理分歧时的坦诚沟通上，更体现在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非洲“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战略定力上。其核心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实”，在于务实高效的合作成果。中国对非合作坚持“言必信，行必果”，着力将承诺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实效。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框架，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再到“九项工程”，一系列举措层层递进，目标明确，成果显著【此处建议引用历届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文件】。这种“实”是对历史上“坦赞铁路精神”的现代化传承，旨在让合作红利切实惠及中非人民。

“亲”，在于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中非关系的根基与未来在于人民。中国通过扩大文化交流、青年互访、学者互动和医疗、教育等民生合作，不断夯实中非友好的社会基础。例如，中国长期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并在历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如埃博拉、新冠疫情）提供紧急援助，书写了中非人民同舟共济的感人篇章【此处可引用中国卫健委或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报告】。

“诚”，在于恪守承诺的担当精神。中国在处理对非事务中，始终秉持最大的诚意。特别是在非洲国家关心的债务问题上，中国是G20成员国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解决方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真诚支持和负责任态度【此处建议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G20关于债务处理的相关报告】。

“正确义利观”是“真实亲诚”理念在利益层面的具体展开。它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在处理与非洲国家关系时，有时要重视“义”，必要时“舍利取义”。这要求在对非合作中，不搞唯利是图的短视行为，而是注重项目的长远发展效益和对非洲国家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与某些国家将援助政治化、附加苛刻条件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深度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优越性。其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合作从不附加政治条件，这并非回避责任，而是对非洲国家主权与尊严的最高级别尊重，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生动实践。它打破了“中心-边缘”的依附性世界体系，探索出一条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处、合作共赢的新路，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因此，新时代的中非关系，是在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创新的理论指引下，迈向构建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非双方在新时代的共同战略选择。

2 现实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度融合

在历史与理论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新时代的中非关系进入了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的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最活跃、最富成果的实践领域。本章将深入剖析中非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两大核心领域的深度融合，展现中国如何将自身发展经验与非洲大陆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助力非洲破解发展瓶颈，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2.1 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破解非洲发展瓶颈的战略支点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非洲内部贸易、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起飞的关键瓶颈。中国基于自身“要想富，先修路”的宝贵发展经验，深刻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交通、能源、通讯等网络的依赖性。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将助力非洲实现互联互通作为优先方向，这并非简单的项目输出，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在非洲的本土化实践，旨在为非洲经济起飞铺设“跑道”。

数据与案例支撑了这一模式的显著成效。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中国企业在非洲累计修建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还建设了大量电力、通讯设施【此处建议插入具

体参考文献，如《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2021 年】。这些宏大数据背后，是一个个改变国家命运的标志性工程：

蒙内铁路（肯尼亚）：作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这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造的现代化铁路，已成为拉动该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它不仅将蒙巴萨至内罗毕的货运时间从原来的 20 多小时缩短至 8 小时以内，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更直接为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并带动了铁路沿线的商业开发和产业聚集。据肯尼亚官方统计和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蒙内铁路对肯尼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拉动作用约为 1.5%至 2%【此处建议插入具体参考文献，如肯尼亚铁路公司报告或世界银行相关评估文件】，是“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理念的生动证明。

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作为非洲第一条全线采用中国电气化铁路标准建造的跨国铁路，它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亚吉铁路将内陆国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时间从原来的 7 天缩短至不足 1 天，激活了其作为“东非门户”的区位优势，成为埃塞俄比亚工业产品出口和必需品进口的“生命线”。

深度分析认为，这种“筑巢引凤”式的合作模式，其核心在于帮助非洲培育自主发展的“造血能力”。与西方传统援助往往侧重于消费性、救济性领域不同，中国的基础设施合作聚焦于生产性领域。通过建设交通网络，打破了地区隔绝，降低了交易成本，为资源流动和产业转移创造了可能；通过建设电站电网，解决了工厂和城市的能源需求；通过建设港口，打通了参与全球贸易的通道。这实质上是为非洲国家搭建了经济起飞的“骨架”和“血管”，使其具备了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条件，从而实现从“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根本性转变。这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确义利观”中“以义为先”的体现——中国通过帮助非洲夯实发展根基，谋求的是双方更长远的共同利益。

2.2 产能合作与农业现代化：助力非洲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引擎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更高层次的合作——产能合作与农业现代化铺平了道路。这直接契合了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中关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体现了中非合作与非洲自身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接。

在产能合作方面，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推动非洲工业化的重要平台。这些合作区通过集群式投资，将中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非洲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关税优惠相结合，有效地帮助东道国建立本土制造业体系，提升产品附加值。

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经过十余年发展，已吸引上百家企业入驻，形成了纺织服装、石油装备、高低压电器、新型建材等产业集群，累计产值超过数十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上万个就业岗位，被誉为“中埃合作的金字招牌”。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作为埃塞俄比亚首个国家级工业园，吸引了包括华坚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制鞋、纺织、汽车企业。其中，华坚集团的入驻使埃塞俄比亚一跃成为该国最大的制鞋出口国，展示了“中国经验”助力非洲实现轻工业“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此处建议插入具体案例的产值和就业数据】。

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中国将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对非合作的优先领域。通过推广杂交水稻等先进农业技术，中国助力非洲提升自主粮食生产能力。例如，中国农业专家在马达加斯加培育出的本地化杂交水稻品种，产量达到当地传统品种的2到3倍，为破解该国粮食短缺难题作出了直接贡献【此处可插入具体推广面积和增产数据】。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不仅回应了非洲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也为非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针对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债务陷阱论”，我们必须予以清晰辨析和有力驳斥。首先，债务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非洲国家为弥补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而举债发展，是其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将债务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是片面的、不公正的。

其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数据，在非洲的整体外债结构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占的份额远高于中国【此处建议插入IMF或世界银行关于非洲债务结构的权威报告数据】。中国对非融资只占非洲外债总额的较小部分。

最关键的是，中国提供的贷款主要用于生成生产性资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如前述的铁路、港口、电站，能够持续产生经济效益，提升东道国的长期财政收入和偿债能力。这与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贷款有本质区别。所谓“陷阱”无从谈起。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G20缓债倡议，是非洲债务问题的“解决者”而非“制造者”。这一论调实质上是某些势力为抹黑中非合作、维持其传统影响力而炮制的“话语陷阱”。

3 政治互信与全球治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战略协作

中非关系超越了一般性的经贸互利，其战略深度和全球意义在于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如磐石的相互支持，以及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过程中的紧密协作。这种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与战略协同，构成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支柱，也是对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的有力回应。

3.1 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在关乎主权、安全与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中非关系正是达到了这一境界，成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生动实践。

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非洲国家始终与中国站在一起。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一个中国原则。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国际场合，非洲国家长期坚持这一原则，有力挫败了任何企图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图谋【此处建议引用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文件或联合国大会相关会议记录】。此外，在涉疆、涉港、人权等议题上，面对外部势力的无端指责与干涉，众多非洲国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舞台发声支持中国，共同维护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此处建议引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相关会议上的非洲国家代表发言记录】。这种支持并非交换，而是基于双方对主权平等原则的共同珍视，以及对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的相互尊重。

中国同样在关乎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为非洲仗义执言、提供支持。中国一贯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非洲热点问题时，中国始终注重听取非洲国家的意见，反对域外大国为谋求私利而强加解决方案。同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向非洲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此处建议引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DPO）的公开数据】。

这种高水平的政治互信，根植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相似的国际处境。双方都曾饱受殖民主义和外来干涉之苦，因而对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着刻骨铭心的共同认知。这种基于相似历史遭遇和共同战略诉求的相互支持，是对那种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迫选边站队的霸权主义行径的最有力回击，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

3.2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南方”的协同崛起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非洲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FOCAC）是双方开展集体对话、进行全球治理协调的重要平台。自2000年成立以来，FOCAC已发展成为引领中非合作的旗帜。它不仅是务实合作的高效机制，更是政治协调和全球治理政策对接的关键舞台。在FOCAC框架下，中非双方定期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协调立场，共同倡导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FOCAC每届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都明确载有双方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共同主张，例如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安理会等机构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此处建议引用最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中关于全球治理的章节】。

金砖国家机制成为中非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又一重要渠道。近年来，金砖合作机制的扩员，特别是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非洲重要国家的加入，显著提升了非洲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处建议引用金砖国家领导人历次会晤的《厦门宣言》《约翰内斯堡宣言》等文件，以及关于扩员的官方声明】。这一进程与中国长期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高度契合。中国积极支持金砖机制扩员，正是希望与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广大非洲国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小院高墙”的脱钩行为。深度分析认为，中非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战略协作，其核心目标是推动国际秩序实现更大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双方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教师爷”做派和强权政治，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通过FOCAC、金砖机制以及联合国等多边舞台的紧密配合，中非正以实际行动证明，“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国际格局中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共同为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贡献力量。

4 挑战与展望：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提供的新选择

4.1 面对的挑战与应对：在风浪中行稳致远

中非合作的深化并非一帆风顺，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际格局的演变与非洲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何有效统筹发展与安全，成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必须解答的课题。

首先，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域外大国对中非合作的干扰增多。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某些传统大国出于维护自身地缘政治优势和意识形态偏见的考虑，加紧对中非合作进行污名化和遏制。除了此前所述的“债务陷阱论”外，诸如“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等不实论调亦被反复炒作，意图离间中非友好关系【此处可引用国内外权威智库报告中关于对非舆论战的分析，注意甄别和批判性使用】。此外，部分国家推出的所谓“对标”倡议，虽宣称旨在支持非洲发展，但其背后蕴含的竞争性与排他性色彩，可能迫使非洲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破坏了国际合作应有的开放包容精神。

其次，非洲内部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对可持续发展构成直接威胁。萨赫勒地区、非洲之角等地的恐怖主义活动、局部武装冲突以及政局不稳定因素，不仅危及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对中国在非项目与人员的安全构成了现实挑战，增加了投资与合作的政治风险【此处可引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非洲地区安全形势的讨论文件或相关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报告】。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中非双方展现智慧和战略定力。在政治层面，双方应继续加强战略沟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共同讲好中非合作共赢的故事，挫败任何离间阴谋。在安全层面，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通过合作维护非洲安全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可以通过支持非洲自身能力建设来“授人以渔”。这包括：在联合国框架下更加积极地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根据非洲国家意愿，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反恐物资援助与人员培训；支持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在“以非洲方案解决非洲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处建议引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议题的发言】。通过将发展与安全更紧密地结合，中非合作才能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

4.2 未来展望：迈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尽管面临挑战，但中非合作根基深厚、前景广阔。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其核心要义在于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共同富裕，这为渴望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新选项。

未来，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在以下关键领域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数字经济赋能非洲跨越式发展。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等领域的领先经验，正通过华为、传音等企业深度融入非洲。从建设数据中心、光纤网络到推广移动支付和智慧城市方案，中国技术正助力非洲跳过传统发展阶段，直接驶入数字经济的快车道。例如，华为与多国合作实施的“数字人才”培训计划，已为非洲培养了大量数字领域专业人才【此处建议引用华为发布的《非洲数字人才白皮书》或类似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绿色发展合作应对共同挑战。非洲大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极为脆弱，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资源。中国在光伏、风电产业拥有全产业链优势，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从东非的巨型光伏电站到分布式的户用太阳能系统，中国的技术和服务正帮助非洲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自给，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处建议引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关于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的案例研究】。

本土化人才培养奠定长远根基。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中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成功模式，正通过“鲁班工坊”在非洲落地生根。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已在非洲多个国家合作建成数十个鲁班工坊，聚焦于智能制造、新能源、轨道交通等非洲急需的专业领域，为当地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此处建议引用中国教育部或承办院校发布的鲁班工坊年度报告或数据】。这种“授人以渔”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从根本上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关键举措。

结论而言，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建立在双方共同应对挑战的韧性之上，更建立在发展路径的共鸣与互补之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展示的多样性，极大地鼓舞了非洲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路径的信心。通过深化在数字、绿色、人才培养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中非关系必将超越传统的“援助-受援”或“资源-市场”模式，迈向一个更具创新性、更可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光辉典范。

参 考 文 献

- [1] 李炳穆. 理想的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的素质与形象[J]. 图书情报工作, 2000, (2): 5-8.
- [2] 陶仁骥. 密码学与数学[J]. 自然杂志, 1984, 7(7): 527.
- [3] 亚洲地质图编目组. 亚洲地层与地质历史概述[J]. 地质学报, 1978, 3: 104-208.
- [4] DES MARAIS D J, STRAUSS H, SUMMONS R E, et al. Carbon isotope evidence for the stepwise oxidation of the Proterozoic environment [J]. Nature, 1992, 359: 605-609.